

沉默而又錚然的台灣史

作者：李郁萱

書名：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——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

作者：陳翠蓮

出版社：台北時報文化

出版日期：1995年

本書摘述：

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戰後史上一個衝突面最大、死傷最慘重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，它造成了台灣人民深刻的傷痛，此後台灣人對政治冷漠，對政府敵視，將國民黨政府看作如同日本殖民政府的『外來政權』，並因此形成不少反動勢力。

國民政府在統整和收復戰後中國就出現種種弊端，種種接收不當和復員失策打擊人民信心，使共產黨獲得支持，最後使國民政府撤退來台。種種弊端台灣人民一無所知，歡欣鼓舞於擺脫殖民，日後現實的殘酷與期待的差距，成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。

台灣人民起初歡欣鼓舞準備迎接國民政府軍，但卻受到極大的印象衝擊，此外長官公署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大權，使民眾產生「總督府制復活」感，更使台人感到不滿，民怨加深，對政府漸失信心。

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在於查緝私煙造成的血案，民眾包圍長官公署要求懲兇，但武裝部隊開槍使局勢惡化，爾後混亂擴及台北城並傳播全台；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，維持治安、擔任官民橋樑，然而其角色由“事件救火者”趨向“政治改革者”，使長官公署更加不安。不論群眾或處委會，因內部分子複雜、目標不一，互相抵銷力量，甚至受到官方分化利用，使原本看似有力的情勢成為軍隊鎮壓的藉口。

二二八事件也與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有關，它形塑出具有潛在尖銳衝突性質的政治環境，台灣人成為派系鬥爭下的犧牲品，從此對政

治退縮、對祖國不再抱有期待。

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民眾對戰後台灣的經濟混亂、官員風氣敗壞、社會困頓的不滿積怨之總爆發，但事件過程中包括派系恩怨、當局謀策等諸多外力介入，使情勢脫離台人掌控。國民政府將事件原因認於共產策動、日人遺毒、美國陰謀，不過是推卸責任。

心得評論：

自從解嚴之後，台灣逐漸向民主化發展，二二八事件作為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的重大事件，對日後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具有極大影響，因此成為顯學；學界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著述相當多，政府也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檔案整理、責任歸屬研究，民間同時有許多當年的受害者或遺族現身說法。之前台北市文化局拍攝的《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——林江邁》紀錄片雖然頗有爭議，但同時也證明了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的歷史地位。這段原本沉默的歷史如今錚然而響。

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——二二八的另一面相》正如書名所說，從不同的角度對二二八事件進行剖析：作者首先分析國內外情勢，從事件爆發的背景因素開始談起，簡述事件爆發過程，並討論派系鬥爭與此事件的關係，以及國民政府的因應策略，最後論述外國勢力與二二八事件。這本書闡述未曾了解過的二二八事件面相，特別是派系鬥爭方面以及蔣介石決策派兵的考慮。

書中首先提到戰後中國，從中國方面的問題就可以看出，國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在中國時就有很大的問題，接收不當、經濟失序，並且還有派系鬥爭、貪污舞弊……等問題，動搖了國家基礎，使共產黨趁隙獲取民心；而國民政府沒有反省本身缺失，改善社會問題、恢復民生，只是一味追剿共產黨，妄想消滅共產黨也就消滅了一切問題。事實上，即使剿滅了共產黨，如果社會和政治的種種問題沒有獲得改善，那麼動亂是不會消失的，正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。

其實，二二八事件是一種「官逼民反」的模式。可以想像台灣人

民歡欣鼓舞期待新政權，卻在見到“祖國”軍隊後幻想破滅的失望心情，而政治上不平等的待遇、官員貪污腐敗、長官公署如同總督獨攬大權，以及種種與生活攸關的經濟問題，如米荒、通貨膨脹，更加深了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。台灣人原本期待在日本政權離開後，身為「同文同種」的“祖國”政權，能夠給予台灣人一個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，但結果國民政府表現的並不比日本政權好，甚至還要更差，在這樣的期待與反差下，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其實是可以預見的。

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後，國民政府的處理態度大有問題：事件前就採取了錯誤的統治方法，這套方法在大陸導致民心背離、共產黨勢力擴大，國民政府並未細思問題所在，仍然在台灣照本宣科，對台灣人民也沒有確實做到『一視同仁』，使民眾不滿逐漸累積；事件後並未把握黃金時機嚴懲兇手，沒有順應民情推行社會改革，最後更進行血腥鎮壓，使人民害怕，對政府失去信心。二二八事件造成蔣氏政權必須以強制手段實施戒嚴長達三十八年，使台灣族群分裂，人民對政治冷感。

書中論及派系鬥爭的部分，這是以前關於二二八事件論述較少提及的，讓讀者能更加了解二二八事件的“不可避免性”。當時情勢是各派系互相爭奪權力與經濟利益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使有建設或改革之心也因彼此互有矛盾而難以做到，更何況長官公署根本沒有建設台灣、恢復既有工業的想法，只將台灣視為輸送大陸物資的原料地，不積極處理台灣社會、經濟問題，事件爆發後自然傾向直接以武力鎮壓。

蔣介石會選擇以武力鎮壓台灣，除了作者提到的有餘力派兵、認為是共產黨煽動動亂以及顧慮國際反應之外，個人認為蔣介石還考慮到派系鬥爭的問題：透過二二八事件，對台灣進行大規模鎮壓與清鄉，一方面清除原有的士紳勢力，便於日後建立忠於國民政府的新士紳階級，另一方面藉著誅殺、調回國民黨派系人物，趁機消除非蔣派系在台灣掌握的勢力，培植鞏固屬於蔣介石自己的勢力。前者在蔣氏

政權遷移台灣時仍然不斷進行，故有「白色恐怖」時期，後者則可從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看出端倪。魏與宋子文交好，屬於宋派，而孔宋一派是蔣介石較能影響控制的，同時魏在美國形象良好，可以消除美國對二二八事件的關注與疑慮。自魏道明始，蔣介石逐步提選自己派系人物擔任在台官僚，徹底掌握在台政治與經濟權力。

此書前段將二二八事件歸咎於派系鬥爭，有些替陳儀翻案的意味，但後段又猛烈批評陳儀請調援兵的種種作為。作者應該認為二二八事件不能全數歸咎陳儀，忽略當時台灣政治生態與現實，但也不能將陳儀視為事件受害者，因其當時事實上是有相對主動的能力與地位的。不過書中對這樣的看法並沒有特別強調，反而是對陳儀正面與反面的觀點較為清晰，容易讓人產生混淆。

個人認同作者的看法，二二八事件並不能完全歸咎陳儀，造成血腥鎮壓這樣的結果也不只是一個人的責任，只是國民政府掌政時期，不敢將內部鬥爭放到檯面上，也不敢論及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歸屬，於是陳儀成為歷史課本中昏庸、腐敗的官僚人物，擔負一切罵名。仔細想想，陳儀能在國民黨的派系鬥爭中生存，可見是很有政治手腕的人，當時情勢下，他也只能隨派系鬥爭起舞以保住個人權勢；且因為他習慣派系鬥爭的環境，同時面臨共產黨不斷的威脅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會聯想到這次事件是由共產黨煽動，其實無可厚非。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，目前學界爭論不休，尚無定論，但至少能確知並非如同過去歷史課本所說，全都歸咎於陳儀。

作者在結論中批評台灣人民沒有努力奮鬥、開創新局的自主意識，事件後又陷於自憐與恐懼，遠離政治。個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，確實台灣民眾太高估自己、太低估國民政府，但不能因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失敗，就全面否定他們試圖與國民政府交涉改革的努力，甚至認為這些努力只是「附庸心態」；在“白色恐怖”時代，仍然有許多人不斷批評國民政府缺失，呼籲進行改革，這些人難道沒有開創新

局的自主意識？難道他們的生命不能作為努力奮鬥的象徵？確實台灣人民在戒嚴時期不敢論及政治，解嚴後看似對政治冷淡，但那也是對當年血腥鎮壓以及“白色恐怖”的不信任創傷，這些心靈的傷口需要時間復原。現在的台灣人如果不關心政治，電視上又怎麼會出現那麼多政治 call in 節目？又怎麼會產生「藍綠對立」的立場問題？

結語：

二二八事件是整體大環境影響下釀出的悲劇，國民政府派系鬥爭、抗戰後中國人對日人和台人看法、經濟失序通貨膨脹……許多原因堆疊下，終於坍塌，這便是二二八事件。它是難以抹滅的傷口，但隨著時間流逝，傷痕終究會結痂癒合，總有一天，它留存於歷史之中但不再是沉默的悲鳴。

該記住的是教訓，而不是仇恨。